

Werker Collective

藝術、勞動、出版、檔案 與社會變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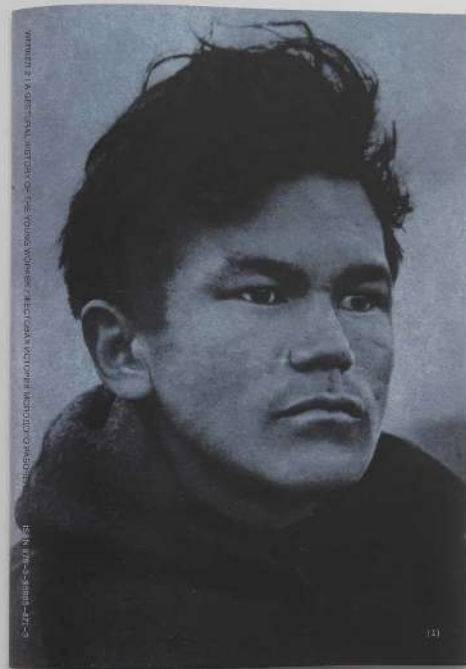
採訪: 陳臻 | 文字: Laura Kell | 翻譯: 陳臻

Werker Collective (以下簡稱WC) 是一個由馬克·羅伊格·布雷薩 (Marc Roig Blesa) 和羅吉爾·德爾福斯 (Rogier Delfos) 於 2009 年在阿姆斯特丹創立的藝術組合。他們的藝術實踐包含裝置藝術、表演、影像、聲音、紡織印刷、數位出版等, 並以出版社的身份發布了十期名為《WERKER MAGAZINE》的刊物。他們也和社區合作, 組織讀書會、電影俱樂部、Podcast和出版工作坊等活動。對於他們來說, WC 是「在勞動、生態女性主義和 LGBTQ+ 運動的交集上運作, 實踐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視覺影像的批判, 分析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哪些內容會被看見、而哪些內容則經常被隱藏或消音」。WC的創作靈感來自於 1920 年代歐洲工人攝影協會發起的自我組織激進攝影實踐, 而他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跨界且跨國的工作網絡, 他們不僅和研究人員、博物館和檔案機構合作。還透過與學生、文化工作者、自組織的家庭工作者工會、無證移民的共同創作, 關心包含反迫遷運動、女性主義團體、LGBTQ+ 社群以及不同精神和身體狀態光譜上的族群。

自 2009 年馬克和羅吉爾開始合作開始, 馬克已經積累了數百件的檔案物件, 現在, 在他們阿姆斯特丹的 Nieuwmarkt 社區的工作室中, 收藏了與自組織、勞動相關的檔案文獻, 累積超過 3000 件攝影集、書籍、海報、宣傳單、電影、紡織品和其他周邊物件, 這些檔案是來自書店、二手市場及他們廣大的合作網絡。對他們而言, 檔案室是社區行動與創造替代性歷史的

空間，通過分析可見與不可見的政治，探討在不同政治制度和社會系統下哪些內容能夠被展示，哪些則被隱藏。對於WC來說，重新整合檔案材料使其能夠生產出新的意義，而這樣的工作方法使用在印刷出版上是最適合不過了，他們並沒有將出版品當作表達自我觀點的工具，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提問，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自行探索和補充。

Werker 將出版作為一種研究如何「用影像書寫」的方式——即影像充當文本的功能，反之亦然。他們偏好出版印刷物，而非數位出版，是因為實體的出版物能夠創造一個社交空間：讓知識能在閱讀過程中被創造並且共享。他們認為實體出版物是在地化且以社區為基礎的，這些出版物被設計為可以方便攜帶，並且讓讀者能夠運用身體去和出版品互動。他們許多出版物的尺寸比一般讀本要大，例如《Werker 2 - 年輕工人的姿勢歷史》(2023)，其尺寸為 22 公分寬、32公分長。當材料的大小不同時，身體與之互動的方式也有所差異——攤開大尺寸的材料就像是一場表演，邀請讀者共同閱覽。探討身體如何面對或觀看檔案影像，也是 Werker 的核心問題之一。





當這類作品以展覽形式呈現時，例如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辦的第五屆當代藝術工業雙年展上，展覽設置成迷宮般的設計，以強調從不同角度和方向觀看影像的可能性，既是視覺上的，也意識形態上的多重解讀。



↑ A Gestural History of the Young Worker, Installation view. 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Idea: Retrospective. Gropius Bau. Berlin, 2023.

如果說出版是他們啟動檔案的主要方式之一，那麼其他方式還包括讀書會、小組討論、教學，以及讓外部人員使用他們的檔案，所有這些作法都是為了創造一個社區空間，鼓勵讀者行動起來。WC目前在荷蘭的里特菲爾德學院()教授集體設計實踐，指導學生如何作為一個團體進行自我組織、處理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張力、如何定位自己作為藝術家的聲音、辨識主流敘事，並創造對抗性敘事——他們認為這些都是藝術研究的基礎方法。

他們還在其他計畫中與學生合作，例如 2015 年的「年輕工人的相機」計畫。他們將傳統膠片相機寄送給多個國家的學生社群，相機背面貼著標籤，指導學生拍攝自己與工作的日常關係。隨後，他們開設了一場工作坊，讓學生為這些照片添加標題，並將其分成不同的視覺類別，從而創造了一個自我發聲與互相聆聽的替代空間。

工作坊和讀書會是 Werker 實踐的一個常見方法——例如在 2022 年的 Rijksakademie 開放工作室中，裝置作品《業餘檔案：關於酷兒再生》則是透過讀書會啟動了這份檔案，邀請人們自由地朗讀或表演這些材料，讓檔案以任何他們想要的方式展現。這些項目的魅力在於方法與組織方式非常簡單，可以在其他地方重複實行。WC認為，創建可跨時間、空間的方法是他們工作的重要部分，他們所做的就是「創造學習方法來質疑知識」。



↑ Amator Archives: On Queer Reproduction at Rijks OPEN 2022, Reading Rehearsal.

這反映出一個更大的共享與生產知識的理念。WC指出，語言與知識的分配與權力組成以及誰擁有話語權息息相關。正因如此，他們認為藝術並非一種裝飾，而是「重新協商哪些感知形式更具價值以及這些形式如何建構現實」(a renegotiation of which forms of the sensible are valued and how those create reality)。在解釋為何選擇出版作為社會行動的載體時，他們相信改變圖像和文字的生產方式就能進而影響世界，因此他們的終極目標是「分享非壓迫性的語言創造方法」(share methods of non-oppressive forms of creating language together)。

一個很好的例子是WC目前正在進行的社區雜誌《Nieuwe Nieuwmarkt》，聚焦於阿姆斯特丹的 Nieuwmarkt 社區，探討當地在住房危機中的抗爭。該雜誌的靈感來源於 1971 年至 1972 年期間由 Nieuwmarkt 行動小組發

行的小報《Nieuwsmarkt》，這個小報的發行是為了抗議市政府計劃拆除 Nieuwmarkt 和 Lastage 社區以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線的決定。



《Nieuwsmarkt》1975。

《Nieuwe Nieuwsmarkt》則是從歷史當中抽取線索：其視覺風格借鑒了 1970 至 1980 年代於倫敦發行的雙月攝影雜誌《Camerawork》，該雜誌推廣人道主義、社會主義和行動主義攝影。《Nieuwe Nieuwsmarkt》將歷史時刻與當代事件聯繫起來，創造跨代的連結。例如，首期內容包括由設計師 Experimental Jetset 設計的折疊海報，展示了由前 Provo 成員 Rob Stolk 拍攝的 8 張聯絡表，Stolk 曾是 Nieuwmarkt 行動小組的活躍成員之一，負責印刷 1970 年代《Nieuwsmarkt》小報。此外，雜誌還收錄了由 Spookstad 編寫的佔屋手冊和來自阿姆斯特丹市民的住房危機聲明。



WC 認為，控制語言分配的人同時掌握著人們如何使用城市的權力。這種透過印刷和自我組織的語言，正是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幫助阿姆斯特丹

的市民創造出新的聲音，倡導將住房視為一項權利而非特權，並最終推動政策制定者啟動和維護社會住宅計畫。首期雜誌中的一篇文章聚焦於「版權共享」而非「版權所有」的概念，從而反思我們如何分配和分享內容。Werker 的反資本主義觀點還體現在他們對「作者身份」的態度上，他們認為「作者身份」是一種私有化且過度神聖化的資本主義概念，遵循著「界定自有」的邏輯，作者身份應該是無足輕重的，我們應該在反主流媒體和社區運動的（再）創作中，重新塑造文化。在勞工運動中，重點在於傳達訊息，而非美化其背後的作者。50 年前，印刷物和大眾出版物曾是佔屋運動的重要催化劑，Werker 的這本新的半年刊雜誌（第二和第三期計劃分別討論身體政治和生態問題）正是試圖重新介紹這個概念。

想象一個人人負擔得起的城市願景，從內而外激發出相互支持的能量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，創建了一本社區雜誌，並以「激進定價」7 歐元發售，這個價格僅僅覆蓋印刷成本。此外，雜誌也會寄送至當地圖書館和社區中心，供民眾免費取閱，進一步推動社會正義。而他們之所以選擇低價而非完全免費，是出於 WC 對免費分發紙製品的倫理考量：免費分發可能會改變讀者的參與態度，降低對這份印刷品的責任感，進而增加隨意丟棄的風險。

此外，該雜誌的一部分資金（主要來自社區支持，例如阿姆斯特丹的無政府主義女權組織的補助）專門用於支付所有為雜誌貢獻的工作者。在藝術實踐中，Werker 深入探討勞動的意義，認為未付酬勞或酬勞不足的勞動實質上是對勞動的消解，甚至可視為一種隱性的暴力行為。身處藝術家和教師等職業不穩定的群體中，Werker 著力肯定文化工作的價值，並主張若無法為每一位參與者提供合理補償，則不應該進行這個計畫。

2020 年，於阿姆斯特丹的 Rijksaka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 駐村期間，他們創建了「藝術工作者權益」（Art Workers' Rights, AWR）平台。這個平台的誕生源於駐村藝術家與學院工作者之間的一系列對話，這些對話聚

焦於藝術工作對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在情感和身心健康上的影響。通過公開徵集，他們收集了十二條留言，並將這些留言與 Werker 檔案中關於藝術工作者自我組織的三十份文件結合，最終設計並聯合製作了四幅橫幅。橫幅以參與者收集的鐵氧化物墨水和洋蔥皮染成黃色，並共同印刷於纖維材質上。

AWR 是一個在線檔案庫，接受任何人在網站上提交的數位留言，並作為自出版工具，提供給文化工作者使用，無論是在在地運動還是擴展共享網絡的過程中。



Werker 在其事實宣言《Yes With Us, Never About Us: Art/Workers, Solidarity And Privilege》(2021)中表達了這些理想，主張藝術家應在經濟系統中得到專業尊重，並警示將藝術家和工人對立區分的危險性和適得其反的結果。對於當前的社會環境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共同性。他們認為，對抗壓迫性霸權的團結，需要通過合作的教育實踐和政治行動來實現，從而創造出一種共同的革命語言。同樣地，社會變革的實現仰賴知識工作者和體

力勞動者的協作，而這種團結跨越了彼此的差異。差異反而成為集體鬥爭的動力來源——不同的立場、個體性和脆弱性正是建立真正團結的基礎。

WC 致力於創造團結的空間，並將「來自與其他受苦群體交叉點的話語」納入他們的實踐，包括女性、種族化身體、移民工人和家務工作者等不同群體。在他們的藝術實踐中，再生產(reproduction)是一個核心概念。其中一個面向是重視關懷與維護，優先於增長與生產；另一個則是從反資本主義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一概念。他們的目標是推動「一個尊重生命而非剝削生命的社會」的形成。這一理念也體現了 Werker 作為酷兒集體的定位——他們探索能夠營造關懷和歸屬感的酷兒再生產形式，並追求以反資本主義的方式轉變社會對再生產的理解。對他們來說，檔案的再生產及其相關對話也是一種關懷行為，他們將檔案視為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超個人主義價值觀、追求社區和團結的社會再生產空間。

此外，Werker 對實體檔案的承載方式也極為重視。檔案的架子、盒子和陶瓷書架均由 Marc 和 Rogier 在 Rijksakademie 製作，體現了對可持續材料的考量，進一步深化了他們在實踐中的環保與社會責任理念。

這種實踐是激進社會參與藝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WC 將藝術視為一種生成、動員和再生產知識的工具，用來推動一種彼此關懷的社會狀態。在他們的實踐中，關注的往往是那些被資本主義社會忽視的個體，因此，他們致力於創造「拒斥資本主義與白人父權的反文化」，支持非順應身體的表達。

Werker 的反文化探索有兩個層面。一方面，揭示家庭工作者、醫療保健和教育從業者以及自由文化工作者之間的平行處境——這些群體都面臨收入不穩、行業私有化、無退休保障、高房租、無薪實習和加班等問題。另一方面，針對被歷史抹去的邊緣化身體，Werker 在反檔案工作中努力將這些群體重新呈現出來。透過動員和培養激進的共生關係，以及對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影像研究，Werker 正在重新解構新自由主義文化敘事，並積極構建新的關懷網絡。

本文章由台灣國家文藝基金會 現象書寫計畫贊助



財團法人
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